

2022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 儿童电影百年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 11月30日至12月1日，“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儿童电影学术论坛”于线上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国儿童中心、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主办，采用腾讯会议与直播平台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专家学者、电影事业家、一线创作者及教育工作者，深入探讨儿童电影创作、理论、教育、产业等专业领域的重要话题。

11月30日上午，“儿童电影百年”论坛率先拉开帷幕。自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顽童》(1922年，但杜宇)诞生以来，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100个年头，值此华诞，以“儿童电影百年”为题召开论坛，是对中国儿童电影事业一个世纪的阶段性总结。该论坛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侯克明、副会长李镇联合主持。

侯克明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本届论坛成功举办热烈祝贺，同时阐述了本届论坛的中心议题就是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重要经验。他表示，儿童电影百年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22年—1949年，从中国儿童电影诞生到初步建立，在理论领域，以蔡元培为首的一批教育专家提出了以电影教育儿童的理念；在实践领域，诞生了诸如《迷途的羔羊》、《三毛流浪记》等现实题材的儿童片，这类影片集中表达了社会动荡下对孩子生存状况的极大关注。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儿童电影第一个大发展的阶段，期间拍摄了许多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红色题材儿童片，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还有像《小铃铛》、《花儿朵朵》这类表现社会新时期儿童幸福生活的影片，不仅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道路。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2000年，改革开放之后儿童电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成立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儿童电影学会，于蓝举起了中国儿童电影这面大旗，为儿童电影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推动创作了风格多样、种类丰富的儿童片，比如《小刺猬奏鸣曲》、《少年彭德怀》、《霹雳贝贝》、《我的九月》等，书写了中国儿童电影史上的辉煌一页。第四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伴随整个电影产业的变革，儿童电影也处于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阶段，儿童电影的创作主体从国营制片厂转变为民营制片公司，社会化的创作大幅提高了产量，也面临提升质量的困境，尤其是儿童电影在商业竞争中如何维系发行渠道都是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随后，李镇谈到了举办“儿童电影百年”论坛的初心：儿童电影是伟大的事业，它的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它给孩子们带来快乐，塑造他们的心灵，传递真善美，创造未来。无数人为这个事业奋斗过、付出过心血，需要铭记。本次论坛高朋满座，有电影事业家、理论家，有导演、编剧和演员，大家汇聚于此，讲述关于儿童电影的理性思考，或是感性故事。

首位发言嘉宾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原厂长袁春起，他以“初心不忘砥砺前行——写在纪念中国儿童电影诞生百年之际”为题展开发言，主要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繁荣，受到全社会关注扶持的角度回忆他所经历过的儿童电影。他表示，在一个有着三亿多儿童少年的国度，成立专门的儿童电影制片厂，国家规定每年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儿童故事片，政

府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影片予以资助，全社会都在关心儿童电影的状况，发行放映部门给予特殊的安排，若干电影评奖中都设有儿童电影的奖项，这些优越的条件激励儿童电影工作者认真创作、砥砺奋进，不仅使儿童电影在创作数量和质量上显著提高，更开启了频繁的国际交往，从而成就了中国儿童电影的发展繁荣。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新发表了以“儿童电影：不断开放的领域和边界”为题的演讲。李道新提出，儿童电影是儿童身心成长的刚需，是人生起步阶段，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是形塑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性工程。如今，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以至元宇宙时代的“原住民”，在技术媒介与数字算法日益深入人类经验和日常体验的生存状态里，儿童电影正在走向，也必须走向更具科技感、未来感、思想性、哲理性的路途，这就给中国的儿童电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系教授凌燕发表了以“儿童看与看儿童：关于儿童电影的思考”为题的演讲。她认为儿童电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一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儿童电影观念经历过三次演变：非儿童本位、儿童本位以及合家欢。儿童电影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看，包括儿童本位影片、合家欢影片以及非儿童片；另一个是看儿童，即那些以儿童为主要表现对象，从儿童视角看世界的影片，这其中就存在适宜给儿童看和不宜给儿童看的区别。不同时代下对于儿童电影概念的再梳理，会有利于儿童电影的创作生产和推广传播。

导演张华勋从儿童电影创作的角度回忆了《小兵张嘎》的拍摄往事。《小兵张嘎》是张华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从前期筹备到实际拍摄，张导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比如他给时任北影厂厂长汪洋的汇报促使了汪洋厂决定加强《小兵张嘎》的创作力量，派崔嵬、袁晨、秦威进组，彻底改变了这部影片的命运。又比如欧阳红樱与崔嵬导演关于嘎子形象的不同理解，催生了“嘎子耍嘎，不要漂亮脸蛋”的选角标准，以及安吉斯如何被选中饰演嘎子、如何体验生活的幕后故事，最终成就了儿童电影史中经典的银幕形象。

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江平以“百年电影百年风范”为题漫谈了百年中国儿童电影里的经典作品和代表人物。他分享了《红孩子》、《小兵张嘎》、《鸡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姊妹》等电影的幕后故事，比如《红孩子》拍摄时遇到了毛主席到摄影棚探班的情形；《英雄小八路》如何谱写传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经历；《草原英雄小姊妹》作为动画片改编自真人真事的创新。他表示，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才能创作出深入人心的儿童电影作品。

作家、剧作家张之路深情回忆了童影厂在板房的日子。张之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了刚成立的童影厂，当时办厂条件艰难，上班和办公的地方就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南墙根搭的一排板房，屋顶是油毡，夏天太热，就在房顶上再置上柳条编的凉席，从远处看去就像架着一块块褐色的银幕。没有大会议室，全厂开会就在房前院子狭长的走道里。张之路回忆了童影厂的许多同事以及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当时有句口头禅

“说破嘴，跑断腿，眼泪加汗水”，既表达了儿童电影创业的艰难，也道出了几影厂创业者顽强的奋斗精神。

国家一级导演、原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徐耿以“回顾即展望：我经历的黄金时代”为题发表了演讲。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儿童电影的创作曾经批量地出现过很多优秀作品，不仅产量井喷，含金量也相当高，题材广泛，类型多样，充满艺术探索，而且深受少年儿童观众的喜爱。这些作品大都获得过金鸡奖、华表奖或童牛奖，相当一部分还参加过各种国际儿童电影节，扩大了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儿童电影百年之际，回顾儿童电影走过的路，必须而且必要，期待曾经的辉煌能成为新百年的营养。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苗苗以“伴我成长的儿童电影事业”为题发表了演讲。作为一名儿童演员，她从和观众的书信往来忆起：“当你的作品公映后，会收到全国各地热情洋溢的信，观众在信中为角色和人物命运跟你共情，把你当做那个角色跟你倾诉和人物一样的命运，并从自身找原因。为什么我没能像《豆蔻年华》里的姚小禾一样坚持下来？为什么我的幼儿园里没有苗苗老师？”苗苗谈到，历史把儿童电影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代人手中，我们必须继承先辈遗志，心怀儿童，热爱儿童，唯有热爱才能再创儿童电影事业的新繁荣新高峰！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珠江电影制片公司导演郗虹以“我和我的儿童电影”为题发表了演讲。郗虹回忆了自己与儿童电影的缘分以及投身儿童电影创作的经历，她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儿童电影导演，最需要也很难做到的，是首先疏通自己内心深处的各种疙瘩，才能让作品的血脉经络通畅。你要让你的作品充满阳光，首先自己得是一个小太阳，才能把更美好的东西传递给我们的儿童。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让我们努力做个好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拍出更多更好的儿童电影。

伊朗汉学家、曾任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汉尼·阿德勒通过视频发来祝贺。汉尼谈到：伊朗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双方友谊源远流长，追溯到2500年前，古代丝绸之路是为鉴证。目前，影视传媒在提升国家软实力、重塑文化自信方面有重要影响，影视交流在政府和民间交流中也承担重要使命。伊朗在电影方面，尤其是儿童少年电影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所以伊朗同中国儿童少年电影上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促成两国在亚洲文化新领域，成就新篇章。

此外，中伊文化交流使者、伊朗导演、制片人何飞还特地亲临会场，代表汉尼·阿德勒表达了对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好祝愿。

李镇在总结中提出，本次论坛既有对百年历史的宏观梳理，也有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的回望；既有情感化的生动表达，也有有满理性的分析和阐释。无论在哪个年代，总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中国艺术家投入儿童电影事业。这项事业几经迭代传承，每一代儿童电影人都曾面对过严峻的挑战，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前赴后继，无怨无悔。正因为有他们，百年的银幕上才留下了那么多传播着真善美并足以传世的优秀作品。儿童电影得到了爱的浇灌，同时也滋润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心田。

(李佳蕾)

动画电影中的“非遗”

■文/许思悦

11月29日，由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之首。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这一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非遗”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 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 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 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 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 传统体育和游艺；6. 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非遗”的概念在我国直到21世纪初才确立，纵观中国动画电影的历史，与“非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早在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步阶段，万氏兄弟就已经开始从中国的“非遗”宝库中汲取灵感，融入创作。由他们创作的第一部动画电影长片《铁扇公主》，吸收了中国戏曲的造型元素，形成了有别于迪士尼动画的民族特色。而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身上影厂美术片组借鉴了民间木雕、泥塑的特点，拍摄了木偶片《神笔》。同年，上影厂美术片组成立了动画片《骄傲的将军》摄制组，导演特伟提出要“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门”。“探民族形式之路”也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口号。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动画始终以文化遗产为基石，丰富美术造型、扩充创作题材、拓展表现空间，创造了一系列精品之作。譬如，被誉为集民族形式于大成的《大闹天宫》，影片中人物造型各有其民间渊源。孙悟空吸收了戏曲人物扮相，玉帝的造型结合了财神、灶神的特点，哪吒源于年画中的仙童，七仙女则借鉴了敦煌飞天。而采用了“冰糖葫芦式结构”的《天书奇谭》，则串联起了天书、狐仙、“怪异儿”、“神仙考验”、“聚宝盆”等民间文学元素，充分体现了动画电影的幻想性特点。脱胎于民间剪纸的剪纸片不仅体现了民间剪纸镂空效果（如《金色的海螺》），吸收了民间剪纸的“点影”工艺（如《拾贝》），还借鉴了皮影戏“以弦定级”方法制造特殊动态效果（如《鹬蚌相争》）。不仅如此，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展

现“非遗”事项的创新之作，如《擒魔传》采用了连续拍摄的手法，记录了漳州布袋木偶的演出过程；而《画的歌》则抓住了金山农民画对同一对象多角度展现的构图特点，用原画实现了动画效果。

近年来，民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不断加强，有关“非遗”话题的讨论日渐升温。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者在这一片沃土上又培育出不少佳作。2015年上映的《大圣归来》，对于《西游记》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引发观影热潮，票房高达9.56亿元，观影人次2800万，在当年的全国电影票房榜中位列第十，被业内称为“现象级”电影。而于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角色造型设计取材于《山海经》，再配以土楼、白鹤、莲花灯、石狮子、龙头船、油纸伞、灯笼等文化遗产元素的点缀，凸显了画面的精致与华美。同年上映的《小门神》将神荼和郁垒作为主角，赋予了民间信仰中的门神以凡人的性格与遭遇，令人忍俊不禁。2019年上映的《白蛇：缘起》，顾名思义，脱胎于白蛇传的民间传说。而于同一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对哪吒故事做了解构式的演绎，一时间，剧中的人物形象成为了流行文化符号。于2021年上映的《雄狮少年》直接将舞狮（广东醒狮）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为创作主线，获得了“表达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的赞誉。

纵观以上影片，虽然同样取材于文化遗产，但与之前的作品不同，创作者正在有意识地打破传统题材的窠臼，融入当代审美特点与生活印记。《大圣归来》借助传统题材的外壳讲述了一个“失落英雄”的故事；《小门神》中的门神面临下岗危机，从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奇遇；《白蛇：缘起》借助传统题材的窠臼，融入当代审美特点，创造性地为白蛇传说提供了人物动因；《哪吒之魔童降世》无论在人物造型、人物性格等各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那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喊出了当代年轻人的心声；《雄狮少年》借助非遗事项，触及了传统文化的窠臼，融入当代审美特点，也探讨了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与突破。但不论如何解读，这些影片中的传统文化符号，最后都归于对真、善、美的宣扬。一方面，文化遗产不啻为一种载体，被动画电影创作者赋予了表达功能。而另一方面，由于动画电影的观影主体以青少年为主，这些影片对于文化遗产的宣传与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动画电影对于“非遗”元素的吸收与借鉴，仍然存在着一一些问题，譬如题材的单一重复、视觉元素的盲目堆砌，以及对“非遗”内涵的浅度解读。创作者应当努力将我国丰厚的“非遗”，转化为优秀的时代艺术作品，产生积极、正面、健康的影响，体现“非遗”所蕴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以及审美价值。

